

第二章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 與特性

第一節 前言

依據目前中國大陸的學制，高等技職教育隸屬於高等教育。然而，中共政權建立之時尚未有高等技職教育，其創設的時間則遲至1980年才開始。從歷史與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，另一種教育型態的出現自然有其獨特的因素與背景，基於此種觀點自然有必要對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作概括性的討論，以了解高等技職教育的創設時空背景與因素，並可於依據相關的研究發現，加以討論一些存在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應注意的問題。所以本章主要的內容重點在於探討以往國內研究者，對彼岸大陸高等教育所從事的相關研究：

第二節 國內相關研究

關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的劃分，國內現有的研究數量並不多，而且這些研究者似乎並未有一致的觀點。以下僅針對鄭得興、黃政傑、楊深坑等學者較具參考價值的研究加以討論：

首先，鄭得興（民84）認為高等教育發展期的劃分，可以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分水嶺，因為在此年之後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有明確的方針，而高教發展在於配合經濟的政策，所以在1978年的政策轉變，對彼岸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。他進一步將高等教育的發展區分為三個段落五個小時期，其內容如下：

1.1957年以前的史達林模式與恢復、過渡時期：由於中共掌政後

急於將中國引導至社會主義的社會型態，但又無治理全國性事務的經驗，而且其政治意勢形態來自蘇聯，在此情況下很自然的便以蘇聯的建設模式為依歸，所以中共所執行的建設方針直接反應出史達林模式，其特徵是呈現高度集中的計劃。處於這種政治大架構下的高等教育，其發展亦呈現蘇聯化的特色。例如在體制上，大陸高等教育所進行的四次院系調整，所依據的是蘇聯的高等教育制度。關於教師與研究生的培訓，蘇聯為中共所培養的研究生與教師更高達 8,285 人。在教材方面，在當時中共高等學校便採用 1,393 種蘇聯譯本的教科書。

2. 界於 1958 - 1978 年之間的毛澤東模式：在此一時期毛澤東的個人觀點，主導了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的發展，由於在這段二十年的歲月中，中國大陸的政策發生三次重大的變化，所以又可區分為三個次階段。

2.1 1958 - 1960 年間的大躍進時期：在 1960 年以前被稱為大躍進時期，主要的原因是在 1958 年 5 月中共當局決議，分別以五年及十五年的時間超越英國與美國，所以大陸的經貿政策採行極度危險的大躍進策略。如計劃將鋼鐵的產量從 1,050 - 1,200 萬噸間，提高至 2,500 - 3,000 萬噸之間，這種決議便產生土法煉鋼的現象。這種盲目追求高度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危機是，大量人力投注於無關民生的社會群眾運動上，最後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。如從 1959 到 1961 的三年間，國民所得與工業生產值分別下降 28%、34%。當時的高等教育亦受到大躍進的波及，如在 1958 年 9 月中共當局決議，以十五年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，所以大量興辦高等學校，在該年便增設八百餘所高校，在校學生比前一年擴增三分之二。這種現象明顯的指向高教品質的危機，在急速數量的擴張下，社會並無法提供對等的師資品質，這種情形將造成爛竽充數的惡果。是否政府能提供適當的學校軟硬體設備，亦是令人存疑。特別是在 1958 年 8 月時，中共中央決議中央只辦理高等教育中的綜合大學或工業學院，其

餘如農、醫、師範學院等皆交由省市自治區管理。在原本中央財政已不充足的情況下，很難期望地方會對高等學校作大額的投資，何況當時全國正致力於如何的大躍進。再者，匆促的政策也顯示出，大陸當局領導人的個人主觀想法主宰社會的運作，在此種情形下教育很難有妥當的發展空間。總結而言在大躍進的風暴下，高等教育的發展猶如春秋戰國時期所呈現一片混亂的情形。

2.2 1961 - 1965 年間的調整時期：接下來自 1961 到 1965 年間高教進入調整期，調整的原因主要是大躍進拖垮整個大陸經濟，為應付此種日益惡化的情勢，1961 年召開的中共第八屆九中全會提出「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」的新方針。在中國大陸的一元化社會中，高教的發展自然必須遵循黨的決策，所以當時的高教亦邁入調整的局面。這也不難理解何以中共教育部分別在 1961 年 7 月與 12 月，對高校進行大幅裁併，並縮小裁後學校的規模。在這種政策下，高校數量急速萎縮，到 1963 年只剩 407 所，比起裁併前 1960 年 1289 所，只剩不到三分之一 (31.6%)。

2.3 1966 - 1978 年間的文革時期：從 1966 年到 1978 年間的文革時期，屬於毛澤東時期的最後一個階段。在 1960 年代初，由於毛澤東急於以階級鬥爭的手段，來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與改造，以將中國大陸推向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。然而，這種觀點又與當時擁有可觀政治勢力的劉少奇相左，所以文化大革命便在這種政治鬥爭的陰謀下引爆。結果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中國大陸產生根本性的破壞，如在 1966、1967 與 1968 年間的工農總產值，連續下降 9.6% 與 4.2%。這種經濟蕭條直接造成財政收入劇減的困境，顯然高等教育的預算亦受到波及。除了經費問題外，許多社會的精英在這一波的政治鬥爭中被清算鬥爭。如在 1966 年 5 月林彪與江青等人導演的黑線專政論，對許多有高級知識份子扣上反學術權威的帽子，加以迫害。教育界自難幸免，甚至高校遭到裁撤，在 1965 年仍有 434 所到 1971 年只剩 328 所，總共減少近四分之一 (24.4%)。其中原有的六所法政學院全部無法倖免，十八所財政學院只剩兩所。更離譜的是原本四到六年的大學學制，被縮減為二到三年，高校生、本科生與研究生分別遭到停招、停招四年與十二年的命運。總計文革

十年期間的破壞力，單就高教而言，研究生減少十萬人，大專學生更高達百萬人以上，這些影響在未來造成社會人才的斷層。

3.1978年之後的鄧小平時期：1978年之後中國大陸進入鄧小平或是後鄧時期，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於1976年辭世，同年四月四人幫被捕，毛澤東的主要政治勢力乃宣告瓦解。隨後，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產生改變，鄧小平的領導權在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確立，從此鄧小平主義取代之前的毛澤東觀點。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始在經濟方面，進行如火如荼的開放與改革政策。當然，高教方面亦得加入改革的行列，必須配合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，這也提供高教發展一個很好的契機。最明顯的是高校數量的快速擴張，根據何大任(民83)的資料，在1980年高校數僅有675所，但到了1985年已激增到1016所。

從以上鄭得興的研究中，可明確歸納出一個要點，即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，對其高等教育的發展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每一時期的教育政策明顯的反應出當時的政治情勢，而此種情勢又取決於領導者個人的主觀意識。其中主要的緣由在於中國大陸是專制體制，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變成社會運作的最高法則，而領導者所擁有的黨、政、軍權力往往遠超過其他人。這種情形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，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，無論其發展方向或是空間，都是取決於一個或是少數的領導人，所以在質與量方面，高等教育發展均有暴起暴落的現象，處於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下，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前途猶如「看天吃飯的補魚人」。無論急速擴張與萎縮的取向，皆說明大陸高等教育政策搖擺不定，此種情形便連帶產生學校經費、設備、師資等的問題。

其次，黃政傑等（民 85）雖然與鄭得興的劃分期有異，但是亦主張以中共政治情勢及政策指導影響為依據，來劃分高等教育的發展。他們提出四個階段的觀點：

1. 1949 - 1954 年間的初步發展期：中共政權成立初期需求大量的高級人才，所以在此一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呈現兩種特色，即在「短期內」培育「大量的」人力，例如專科學校的修業年限規定為二至三年。另一方面學生數快速的激增，自 1949 年的 22,587 人到 1954 年擴增為 58,573 人，在者短短的五年間成長率超過兩倍半 (259.3%)。
2. 從 1955 年至 1970 年止的大起大落期：在時期呈現大起大落的原因，在於高等教育的發展，受到政治、經濟及政策的調整而大幅變動。如在 1955 年 5 月召開的全國文化教育會議，提出專修科應早日停辦的決議，致使專科生在高等校院學生的人數比率急速萎縮，從 1954 年的 23.2% 到 1957 年降到 10.8%，減少比率也超過兩倍 (214.8%)。然而，在隔年的大躍進時期，高等學校學生數大幅擴增 1.2 倍，專科學佔高校總學生數的比率，又恢復近乎 1954 年的水準達 21.4%，在 1961 年卻又降為不到 5%。單就自 1954 - 1958 四年短短的期間中，專科生數比率的波動程度上下高達四倍，這正反應出中國大陸政治對教育的強大影響力。
3. 界於 1971 與 1981 年間的調整撤銷期：文化大革命後期起，高等專科學校的發展處於調整的階段，如 1978 年時專科學生數增為 378,586 人，在高等學校學生數將近一半(44.3%)。之後政策上的調整限制招生，再加上部份專科學校升格為學院或大學，所以到 1981 年專科生降至 218,827 人 (17.1%)。

4. 1982年之後的恢復發展期：此一時期的高等教育發展再度受到政策面改變的影響而改變，如1982年12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五屆人大批准的「六五」計劃，明顯的造成專科學生數的另一波動，在1980年只有二十八萬人，到1985年已增加到四十萬人，增幅達42.1%。

上述黃政傑等人的研究發現，又再度印證前面的論述。中國大陸當局對高等教育的發展，未能稟持一貫的政策。在每一個時期中大起大落的現象，致使高等教育問題叢生。其中關鍵所在是中國共產黨深陷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泥淖，為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，對社會發展採取計劃性的控制，致使政治措施脫離人類活動的正常模式。人材培育計劃並不以社會常態發展為依歸，政治獨裁者的主觀意念往往決定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綱領。

類似上述研究者的觀點，楊深坑等（民85）以文化大革命作為劃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的依據，因為文革對大陸的教育造成嚴重的破壞，之後才進行重建與改革發展。所以他們將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，劃分為1949年中華中央政府成立至文革前，及1977年文革後迄今兩個時期。前一階段的重心在於消除國民黨在學校的影響力，如廢除國民黨的黨義及訓導制度。並且執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思想，這方面顯現在中共政協在1949年9月舉行第一屆全體會議所通過的「共同綱領」，其中將教育的主要目的定義為「為工農服務」。在文革前的期間中又可以依發展的段落性區分為（1）1949 - 1957年的蘇化時期、（2）1958 - 1960年間的大躍進時期、（3）1961 - 1964年間的調整時期。從1977年之後屬於另一時期，因為鄧小平的政治勢力開始主導中國大陸社會的運作，鄧小平所主張的開放改革對高等教育產生兩個小階段的影響。（1）1977 - 1982年間的重建期：在此期間中共當局針

對高等教育，進行教育理論方針的重建，如「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」、「教育與勞動相結合」、「教育為生產力服務」等新教育方針的提出。其目的在於結束文革時期的政治掛帥，並以政治方式將社會導入。(2) 改革開放的階段，所以，自 1983 年至今的改革發展期被界定為下一時期。

此一段落的要點依然指向政治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宰制力，其中不同政治情勢下的政策轉變，直接的反射出政治上的意識形態，處於這種不確定的情境下，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實難有整體性正面的發展，當中包含著校際間品質的歧異性，其所引發的問題實值得加以深思。下文將依據上述這些研究，進一步探索相關的叢生問題。

第三節 啟示性

儘管以上三個研究對高等教育發展提出不同的劃分期，但是，其中的內容共同顯示出幾項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缺失：

1. **政治主導一切**：由上述可見，這些時期的劃分方式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消長，及政策變化有直接的關聯。在每一個時期中，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或是萎縮，皆起因於政治勢力的消長。這種情形反應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深受政治的牽引，此種特性固然亦存於一般民主體制的國家（姜添輝，民 86a）。然而，政治與教育的互動性往往參雜著經濟的因素，即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被設計來滿足經濟的需求，若無法達成，經濟勢力會迫使政治對教育加以干涉。但是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與政治間的關係，卻不是呈現這種特性，而是政治勢力直接的主宰高等教育的發展。其中主要的緣由，